

書 評

彭 小 妍*

Margaret Hillenbrand

*Literature, Modernity, and the Practice of Resistance:
Japanese and Taiwanese Fiction, 1960-1990*

Leiden: Brill, 2007, xiii+357 pages. ISBN 978-9004154780

本書是東亞文學區域研究方面令人矚目的新作。近年來國際學界逐漸關注區域研究，以國家研究為主的學術傳統開始意識到新趨勢所帶來的挑戰。這並非說，中國研究、日本研究、美國研究、英國研究等傳統領域已無存在的價值；而是意味，傳統國家研究的領域必須體認，在近代以來全球化趨勢下，外來影響時時刻刻滲透國家疆界，如固守一國或一地的文學、文化、經濟、政治研究，已不符合歷史發展的現實。

區域研究在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研究方面已有相當的成果，例如1990年代有關拉丁美洲和亞洲四小龍興起與衰落的探討，¹ 晚近岩瀨功一等學者有關日本通俗文化、音樂、電影、設計等橫掃東亞的研究，² 荊子馨對

收稿日期：2008年1月31日，通過刊登日期：2008年4月23日。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Hsiao-yen Peng is a research fellow in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t Academia Sinica.

1 例如 Gary Gereffi and L. Wymaned Donald, eds.,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 例如 Koichi Iwabuchi, *Recentering Globalization: Popular Culture and Japanese*

日據時代臺灣皇民化的探討，³ 以及1998年起臺灣大學出版的「東亞文明研究叢書」，已出版七十種著作。⁴ 但是在文學領域上仍然有待努力。國外東亞系、臺灣和中國的中日韓語文系的文學研究，到目前為止，主流仍侷限於一國文學或語言，研究中國、日本、韓國的學者在專業上的隔閡，令人詫異。僅有少數的例外，比方說阮斐娜針對日據時代在臺的日籍作家和臺灣作家的英文研究。⁵ 近年來在中國學界值得注意的發展，是北京清華大學王中忱教授所召集的跨院校東亞研究團隊，目前正規劃研究集刊《東亞人文》，將於近期創刊。該團體成員有關中日作家的研究專書，已有可觀的成就。⁶

本書嘗試連結臺灣與日本文學，作者有能力運用中文和日文的一手資料，二手資料雖以英文為主，也運用了若干中文和日文的文獻，是近年來東亞文學的英文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突破。如同本書作者 Margaret Hillenbrand 指出，對出身西方的學者而言，東亞文學各國研究間長期的隔閡，也許是由於語言學習的困難所致；對出身東亞的學者而言，或是因為歷史仇恨和政治禁忌的緣故。（頁15、29）作者認為東亞文學研究的潛力無限，具體挑戰了比較文學領域以東西比較——亦即運用西方理論討論東方文本——為主軸的趨勢，或是長期以來影響研究（influence study）和配對研究（parallel study）的傳統。她並認為，區域研究必須開創新的方法學，才能因應跨國家研究的需求。（頁22）作者以此為前景和目標，本書正好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檢驗作者的表現是否吻合她的企圖。她是否提供了區域文學研究有意義的嶄新方法論？

本書第一章提出理論的架構，主張冷戰後東亞地區日漸興盛的文化交

Transnational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 Leo Ching,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4 例如戚印平，《東亞近世耶穌會史論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高明士，《東亞文化圈的形成及發展——政治法治篇》（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

5 Faye Yuan Kleeman, *Under an Imperial Sun: Japanese Colonial Literature and the Sout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3).

6 如王中忱，《越界與想像——20世紀中國、日本文學比較研究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走讀記》（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又如董炳月，《國民作家的立場——中日現代文學關係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6）。

流，使區域研究勢在必行；區域研究除了挑戰傳統國家研究及東西比較研究，更是展現所謂「另類的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的契機。這是現代中國及日本研究近年來的核心議題：在西方現代性之外，東亞的現代性或後現代性是否並非歐美經驗的延伸和複製，而是多元地理、經濟、文化匯聚所產生的多中心現象？(頁22)作者認為方興未艾的泛亞主義(pan-Asianism)及另類的現代性概念所呈現的理論願景，可以彌補東西比較研究的不足。例如一般所謂的「日式資本主義」⁷或杜維明所謂的「亞洲價值」，⁸事實上還是以西方為參照，只是提出不同於西方的論述，可說是另一種東方主義，終究走不出西方論述的框架。因此作者主張以東亞為主體，將分析的基本架構深植於東亞區域內，以區域內的比較研究作為詮釋的方法；如此不僅可以突破西方主導的老僵局，在實踐上也可以有效顛覆舊式思維習慣。(頁28)

作者由主題研究的角度，在本書主體部分討論冷戰以來三十年間臺灣與日本的小說。她以都市(the city)及性(sex)作為隱喻，說明相關作品如何透過這兩個隱喻，來抗拒官方主導的現代化進程(projects of modernity)。每一章開頭均詳細說明日本與臺灣兩地相關的歷史政治發展或經濟政策，把所討論的小說放在政經歷史脈絡中。第二章至第四章以都市和性的共同主題來貫穿討論，此三章又各以三個主題作為中心：(一)冷戰後性產業的猖獗，反映出臺日文學對美國在東亞的經濟政治文化殖民的抗拒；(二)在經濟奇蹟年代家庭倫理的解體，反映出對官方提倡的倫理秩序的挑戰；(三)消費文化的糜爛，意味傳統生活方式的式微。她認為在東亞區域內冷戰意識形態及現代化進程的背景下，臺灣與日本的文學，在戰後都呈現此三個共同母題。本書所討論的臺日作家，包括第二章的大江健三郎(往下跳，別看！、我們的時代)、野坂昭如(螢火蟲之墓、美國羊栖菜)、黃春明(小寡婦)、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第三章的王文興(母親)、白先勇(孽子)

7 「日式資本主義」奠基於日式的經營概念，涵蓋的經營理念包括「終身雇用」、「年功序列制度」(即年資敘薪制)、「企業內組合」(即企業組織)等。參考本書頁24。

8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in Tu Wei-ming, ed., *The Living Tre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1-35;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村上龍（寄物櫃裡的嬰孩）、吉本芭娜娜（廚房），第四章的三島由紀夫（百萬元煎餅）、村上春樹（舞、舞、舞）、李昂（暗夜）、朱天文（紅玫瑰呼叫你）。以上都是臺灣和日本聲名卓著的現代作家。對臺日現代文學不陌生的讀者，應該會同意，以都市和性的意象來討論他們的作品是很適當的。

本書作者認為，傳統東西比較文學研究——例如英國文藝復興時期和北宋詩歌的比較——最大的問題是，文化差異是無法突破的負擔。（頁36）本書比較區域內歷史和文化背景類似的臺日小說，是否能具體解決文化差異的問題？臺灣和日本雖有歷史淵源和地緣關係，畢竟有相當歧異的文化特質。以第一章為例，作者指出，本章所研究的四位中日作家有關冷戰後美援現象的作品，共通的結構是妓女／皮條客／美軍嫖客所形成的三角關係，此三角關係象徵東亞國家在美國霸權下普遍的臣服心態。作者對此普遍現象的分析中肯深入，例如〈我們的時代〉（1959）中，專攻法國文學的大學生靖男，和中年妓女賴子同居，每晚她的外國嫖客一來，他就必須外出散步。夜復一夜的這種羞辱，在他心目中成爲亞洲和白人的鬥爭。靖男獲得法國文學論文的徵文第一名，預備去法國唸書逃離賴子時，她發現自己懷孕。談判不歡而散，賴子嫁給外國人，靖男想自殺卻沒有勇氣，渾渾噩噩的過日子。〈美國羊栖菜〉（1967）中，主持一家公司的俊夫自甘淪爲皮條客，以引介妓女和性愛秀來討好家裡的美國訪客。性愛秀男主角阿吉聲稱擁有全日本最巨大的陽具，俊夫想以此使美國訪客甘拜下風，但沒想到阿吉臨場卻性無能——因爲美國訪客曾是佔領日本的美軍，對他的心理威脅太大了。黃春明的《小寡婦》（1975）同樣以對美軍性產業的三角關係作隱喻。「歸國學人」馬善行從美國念了管理行銷回臺，發揮所學領導性行業公會，把酒吧名爲「小寡婦」，以清宮的異國風情和小寡婦的「國粹」形象來吸引美國大兵，最後功敗垂成，因爲布扣被扯壞只好改回拉鍊、小姐的花名美軍叫不來而改回洋名等。後來因美軍節節敗退，馬善行又轉回房地產老本行。

第二章所分析的四位臺日作家的作品，的確都以性產業來象徵東亞與美國霸權的關係，但是在此共同的象徵結構下，這些臺日作品究竟顯現什麼文化差異？作者表示，就此性產業三角關係（*ménage-à-trois*）而言，「黃（春明）的小說和王禎和的《玫瑰玫瑰我愛你》（1984）接續了（*continue*）大江和野坂的工作，但是有些關鍵的差異（*certain key emphases differ*）」

。(頁 155) 所謂有些關鍵的差異究竟是什麼，下文並未條列明述，但明確指出一點：雖然臺灣的兩個文本也同樣批判美國霸權，但是個別的美國人在小說中所佔據的份量較小，在《玫瑰玫瑰我愛你》中更是完全沒有出現。作者說，這種差異，可能是因為日本和臺灣的美國經驗不同：「日本感受到美國持續的具體存在 (an insistent physical presence)，但是對臺灣而言，美國力量並不是那麼直接，而是比較制度化 (less immediate and more institutionalized)。」這種說法，可能很多臺灣人不會同意。在六、七〇年代的臺北，美國大兵挽著花枝招展的女人路過的情景，並不陌生。而且，沒有證據，怎麼能說美國在臺灣的干預比在日本更制度化呢？特別提出這點批評，我只是要說明，本書作者所標榜的區域研究方法，讓我們理解冷戰以來臺日小說的共通性，但是仍然無法讓我們進一步了解臺灣與日本的文化差異。我更耿耿於懷的，是上述作者說黃春明和王禎和「接續」了大江和野坂的工作。在黃春明和王禎和寫作這兩部作品的七〇、八〇年代，大江和野坂的作品 (1958、1967) 還沒有中文翻譯，⁹ 中文世界的研究也很少。沒有證據證明他們讀過這兩篇日文作品，何以說他們「接續」了這兩位日本作家的寫作呢？如果說「接續」只是指時間先後，而不是指傳承，那又有什麼意義呢？這和以下聲明又有什麼兩樣：由於相似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戰後日本小說有這樣的主題，臺灣小說也有？全世界沒有相似歷史文化背景的國家，在不同的時代，不都也有這種主題的文學？

第三章「家庭倫理秩序崩解」的主題，亦為普世主題，作者本身其實也心知肚明。她說：在經濟成長的奇蹟年代，「大家庭網絡弱化，邁向小家庭結構，家庭權威不再，社會職業網絡逐漸取代核心家庭的軸心，晚婚，離婚率偏高，單親家庭越來越多，生育率降低，這些都使得戰後日本和臺灣家庭概念蛻變——當然，就像其他地區一樣 (as, of course, elsewhere)。」(頁 173) 第四章的消費文化，也不例外，是近數十年來舉世大都會共同的現象。比較有意思的是，作者指出：日本和臺灣的消費行為的受人矚目，不只居東亞之冠，更超越舉世繁華地區。日本各層次的消費族群對名牌的追逐、

9 我所看見的大江和野坂作品的中文翻譯，有大江健三郎著，鄭民欽譯，《性的人》(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5)；野坂昭如著，賴明珠譯，《螢火蟲之墓》(臺北：貓巴士出版公司，2007)。

精緻品味和個性化的趨勢，比起臺灣更甚；但在臺灣，消費成了生活方式，是選擇繁多、剔舊換新率高、日常美學意識盛行的空前時代。（頁 232）可惜的是，在分析作品時，作者並未發展這個路線。事實上，當代臺灣對名牌、品味、個性化的迷戀，比起日本並不遑多讓。如果用朱天文的〈世紀末的華麗〉來作主要的例子，會相當具有說服力，而《荒人手記》對哈日文化的描寫，則可以連結臺灣和日本的消費行為。朱天文這一代的作家，除了歐美文化以外，對日本文化是很注意的。此外，本章所討論的四篇小說，按照作者的分析，都對消費文化採取批判的態度。其實，臺灣當代有關消費文化的小說並不見得都如此。例如〈世紀末的華麗〉的結尾，米亞預言男性「用理論和制度建立起的世界會倒塌」，並發願以女性「嗅覺和顏色的記憶」來重建世界，似乎宣告了女性消費習性將長存。這毋寧說是描寫舉世女性對消費文化的耽溺、迷戀和追逐，已形成一個足以和男性主導的理性世界相對照的生存網絡。本書作者用作家對現代化的「抵抗」（the practice of resistance）來作主軸，自然限制了她的視野和文本選擇。

行文至此，我想指出：本書所關注的都市和性、家庭倫理崩解和消費文化等議題，是現代社會的普遍現象，也是東西現代文學普遍的議題，不僅中日冷戰後的文學，整個東亞地區、甚至歐美亦如是。以相同的主題來比較東西文學，一直是比較文學的傳統研究方法之一，在理論上很難有任何突破。但就基本而言，本書以東亞為主體，把分析架構深植於東亞區域內，以冷戰後美國在東亞地區普遍性的影響和現代化為背景，探討臺日小說如何反映外在變化，在論述上是具有說服力的，也實踐了區域比較研究上跨越國家疆界的期待。可是就方法論而言，從主題研究出發，似乎又落入傳統比較文學主題研究的模式，也就是找尋配對（parallels）的模式——例如比較東方的「道」與西方的“logos”，或者毫無直接關係的一位東方作家與一位西方作家。本書比較的臺日作品，優點是相通的創作背景和主題，但未見兩方作家間有任何直接的關連；如果分成兩個分別的研究，似乎也未嘗不可。本書以共通的主題來探討區域研究，雖勝於傳統的東西主題比較，但在方法論和理論上，並未真正突破傳統比較文學的配對研究。數十年來研究方法一直是比較文學的困境。從 1933 年 Leo Spitzer 自德國流亡到土耳其，在君士坦丁堡大學建立了比較文學的前身以來，一直到今天，美國的比較文學界還在摸

索：有關東西方文學的比較，什麼樣的研究方法是真正有意義的？就目前比較文學中主流的影響研究和配對研究而言，我認為影響研究是略勝一籌的；至少，這種研究讓我們理解文學思潮、文學作品及文人跨文學文化的軌跡和衝擊，和今天盛行的跨文化研究多少是相通的。

其次，根據作者的分析，她所討論的臺日小說或多或少都展現出對美國霸權文化的抵抗或排斥（本書主標題為 *Literature, Modernity and the Practice of Resistance*）。雖然作者聲明她的目的是脫離以西方標準為參照的模式，但是，整本書的架構，以抵抗（resistance）西方式的現代化為思考模式，還是沒有擺脫它。或許我們應該說，即使是強調區域內的研究（intraregional studies），恐怕也不能擺脫跨區域研究（interregional studies）的視野；¹⁰ 也就是說，即使是東亞研究，也不能不把歐美等其他區域納入討論範圍。東西方的接觸，是歷史上不爭的事實，沒有一個區域能免除來自區域外的影響，沒有一個區域是封閉的，就像沒有國家是封閉的一樣。如果只談區域研究，而不正視該區域和區域外其他地區的互動，那麼不是又落入只談國家研究的狹隘圈套？因此，如要打破國家文學的限制，也應該打破區域研究的限制。

事實上就現代文學的發展而言，經常是一個概念從歐洲傳到日本後，再傳到中國。例如三〇年代的新感覺派，就是從法國途經日本，再旅行到上海的。怎麼能只談日本和中國的新感覺派，而不去探討法國的源頭呢？今天全球化的說法甚囂塵上，但歷史上全球化的現象早已發生。不僅前現代時期物質文明的流通，例如瓷器在歐亞的旅行；現代的普羅文學、世界語運動、無政府主義等等，都是跨越歐亞的文化現象。所以，就東亞研究的學者而言，無論是文學文化領域，甚至是其他領域，不只要學習區域內的其他語言，至少也要能使用一種歐洲語言。說到這裡，我們是否應該想想：傳統的比較語文學（comparative philology）在今天全球化的時代，在我們思考打破國家和區域疆界的當口，是否仍有其煥然一新的價值？區域內和區域外的語文學習，是否應視為人文研究的基礎訓練？這對學者來說，當然是沈重的負擔，

10 本書以區域內研究為重點，但是第4頁有一個小節的標題是“Interregional, interdisciplinary”（跨區域，跨領域）。我贊成 interregional 的理念，但是本小節或全書並未討論跨區域的概念。本小節的標題是否為 intraregional（區域內）的筆誤？

但是，不正視這個問題，就走不出傳統國家研究或區域研究的僵局，更遑論挑戰傳統的比較文學。

傳統的東西影響研究，就今天全球化研究的角度而言，當然仍有其存在的正當性，可是必須同時納入區域研究的視野。因此，我的立場是兩方必須折衝協調，互相對話。我認為，就新的方法論而言，翻譯研究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已經讓我們看見一個契機。這方面，酒井直樹和劉禾的研究具有啟發性，讓我們看見可能的發展。但不可諱言的，酒井不通中文，劉禾不通日文；雖然前者很清楚儒家對日本學術的影響，後者對日本作為中西橋樑的現實，也提供了中、日文相互借用辭彙的清單（此清單是永遠無法完備的），但是實際能純熟使用中、日、韓文資料，深入東亞區域內的翻譯研究，仍有待努力。在這方面，Federico Masini 討論基督教傳教士和日本所造辭彙對現代中國辭彙的影響，可說是拓荒之作，對劉禾的著作 *Translingual Practice* 具有實質的影響。¹¹ 接著，進一步要問的是，在面對東亞社會的現代化或文學的現代性時，除了描寫本地人抵抗、排斥西方（本書是抵抗美國的文化、政治、經濟、軍事殖民霸權）的消極心態，是否可以由積極的角度來看待東、西方的接觸？這方面翻譯研究也可以給我們借鏡。翻譯研究所關心的議題，例如知識的傳播和建制、自我與他者的互相借鏡，外來影響如何使本國語言產生蛻變等等，都可以打開新的研究局面。

本書跨越了臺、日兩地研究，跨越了中文和日文的界限，為區域研究開拓了可能性，是近年來東亞文學研究最令人稱慶的成就。在讚美作者的同時，本文回應作者對區域文學和比較文學研究的檢討，提供了個人的淺見，主要目的並非批評。和作者一樣，本人體認到有必要突破傳統東亞研究和比較文學研究的侷限；在實踐時，也同樣遭遇到必須開創研究方法的困境。因此謹就個人的觀察，不揣贅陋，提供一個思考的方向。

11 Cf. Federico Masini,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Berkeley, CA: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Lydia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